

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

朱光潜

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编译都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重新编辑和翻译是我们当前文艺界的一项头等任务。这项工作只有在结合认真研究、讨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才能做得好,单靠少数编辑人员闭门造车是很难做得好的。我在内部刊物《译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所载的《谈翻译工作》),以及待发表的两三篇短文里,(其中有一篇就《费尔巴哈论纲》译文提出了商榷)和将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发行的《美学》第二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两章的节译,注释和介绍文里也详谈了这个问题。现在有幸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编的一部选集,看到编辑部同志进行过艰巨的努力,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认为这或许是新长征的开始,衷心感到欢庆!

过去在东德、苏联、法国和英美等国也曾出过几种类似的选本。它们好坏不等,但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划了一专题的鸽子笼(纲和目),把马恩论著整章整段地割裂开来,打散了,把上下文的次第也颠倒过来了,于是东捡一鳞,西拾一爪,放进那些专题鸽子笼里去。这样支离破碎,使读者见不到原著的整体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就象“四人帮”所强调的“立竿见影”和所炮制的“语录”。已往所见到的“马恩论文艺”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毛病。其中也有些较好的,例如东

德 Lifschitz 的选本(有中译)和苏联国家出版社编的《马恩论文学》(此选简而精,未见中译),法共编的由 Thorez 写引论的选本也还流畅易读。编得最坏的是俄文的四卷本(我国通用的中译本),一开始不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提“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用大量篇幅选有关“革命悲剧”,“现实生活中悲剧和喜剧”,选目一般很错乱零碎,而且标题往往错误,例如把艺术起源于游戏说硬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看到这样选本在我国竟广泛流行,以及一些美学著作据此发些荒谬议论,就不免令人叹息,这是误尽苍生!因此愈感到我们有自编一部选本的必要,而人民文学出版勇敢地承担起这项工作,是值得欢迎的。

有人认为马克思不曾写过专门美学著作。便以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以为马克思的著作(例如《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贡献寥寥可数,其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共同基础出发,检查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一些文艺名著,从此可以看出一套史论结合的完整体系,为文艺史和文艺批评树立了光辉典范。这正是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所要准确而全面掌握的对象,而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集也正应该能帮助我们达到这种准确而全面的掌

林

握，以便我们运用它来解决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实文艺问题和文艺史编纂问题。

这并不是一件易事。首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还学习得不够，这些年来由于受到修正主义公式教条化的影响以及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我们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集时应正视自己身上可能有的这种影响和流毒。例如选目中单提历史唯物主义不提辩证唯物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主观和客观对立面的统一问题时就会模棱两可或陷入形而上学。例如有些问题近来已掀起了讨论：人性论、人道主义、共同美是否应一律排斥，而单讲阶级斗争和阶级性？文艺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为政治服务或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位置究竟如何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指示吗？《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集的编辑对这类问题决不能熟视无睹。

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过去美学观点的基本差别在于：过去美学家大半都从单纯的认识角度看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扳正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为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和衡量真伪的标准。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文艺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它和物质生产有一致性和紧密联系。艺术不象过去美学家们所说的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劳动，劳动是人发挥他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去改造自然从而也改造自己，使人(主体)和物(对象)两方面都日益达到高度丰富的发展，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携手并进(人尽其能，物尽其利)。没有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就没有物的潜能的发展，主体与对象都不可偏废。这道理也适用于艺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在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

志意识形态》里，就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论劳动过程)以及《从猿到人》里都不断地阐明过美学上主客观统一的观点也就是植根于实践观点。这种观点已是常识，而我们的美学家中居然还有人在对美学的实践观点和主客观统一观点大张挞伐，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一些唯心主义者骗人的鬼话。这种人也在援引《经济学哲学手稿》乃至《资本论》中的论“劳动过程”，所发的一套议论正足以证明他们对这些经典著作根本就没有读懂。因此令人更感到弄通马克思主义是弄通美学的首要条件，而编译一部比较好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更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

从目前这部新选本中冠首的一篇长序文和第一卷的选目看，一些旧框框显然还在起束缚作用，特别表现在《艺术的起源》和《审美意识的发展》等部分，认识还似很模糊。例如既承认“艺术起源于劳动”这一命题“万分正确”，又认为“不应当仅仅限于劳动，“还要估计到意识，语言和自然宗教多方面的因素。”请问：这些因素毕竟还是精神生产，离开劳动能讲得清楚吗？在《基本特征》下提出“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应该“划清界线”。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三十年代发表以来，这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中一个争论很剧烈的老问题。难道马克思自己不是表达得很清楚，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结合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吗？马克思心目中无产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就那么可恨吗？值得进一步考虑和讨论的问题还不仅如此。冠首的序文是常有指导性的，与其代马克思说话，不如多留些地位让马克思自己去说话，让读者自己去据实深思。

在选目方面，过去未选而实际极重要的文献还应添补一些，例如《费尔巴哈论纲》、《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稿论《共产主义与私有制》中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

的结合等于共产主义一段。“异化”已成为国际热烈争论的问题，不应熟视无睹，可否选几段。《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仅阐明了一般理论科学的方法，还明确指出理论科学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近来美学界常只引这段话，而各作各的解释，似有必要举出原文见出真相。宁可少一个次要选目，不可阉割一个首要的选目。各选本选了《资本论》中论《劳动过程》一段本不长，何以把最后最关键的话任意删掉呀？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进一步的、最

具体最鲜明的阐明和发挥，从选集第三卷508——518页十页左右，如果全选也不算浪费篇幅，能否加以考虑？选目应显出科学的纲目条理，见出有机整体。目前的选目有些零乱，迹近拼凑，宜尽量克服这种毛病。

选是一个问题，译的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我在本文开头就已提到这个问题，平时也向党内领导同志呼吁过。张仲实同志在一九七九年《译讯》第四期里所发表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一文，对于一切翻译工作者都是切中要害的苦口良药，我建议把它公开发表，规定每个翻译工作者都应把它奉作指南。

（上接第5页）

比则郑众所谓“比方于物”，刘勰所谓：“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总之同属正言直述之类，不免仍有不易感发之病，所以钟嵘要求作者能有较深的情思，才能使读者玩味其神情，这才与钟嵘论诗主味之说两相合拍了。但钟嵘说虽妙，究竟是否合古人赋比兴之说则还有问题。

论诗到钟嵘可以有这种看法。但如说乐官所执掌之诗在那时已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未必然。所以“直书其事之赋，固然最为明白；“因物喻志”之比，也同样容易明白，总之都是一看便明白。独于兴就不那样易懂，一看便明的。容易知其用的也容易知其体。不易懂的，同时也不容易辨其体和用。

赋之为体，最容易辨，所以也容易明其用。比兴则后世无此体，所以大家都不看作用。即如《硕鼠》一诗前半都是比，很可能最初只有前半首，后来才续下文川说明其志，待到

入乐之时再补写后二章，以表咏叹之情。二者相较，总是比语较多，兴辞更少。《古诗》十九首中如《迢迢牵牛星》一首托为织女忆牵牛之诗，既非常实，显属暗比。又如杂曲歌辞中《枯鱼过河泣》一首，通首不露主题。但后世均不称这些为比体，则以后世此类通首皆比之作也不甚多。所以从民歌言比还可以成体。至于兴，往往只须开头一句，更难成体。但若从民歌观点来看，则吴歌粤歌中均不乏其例。以前乐官所掌，原不妨备此一体。所以风赋比兴可以连在一起。《左传》宣十三年引古语“虽鞭之长不及为腹。此虽是谚实亦诗类，即使古人早已看到歌谣与谚语有分别，但王官职掌，未必作此区分，所以六诗排列次第正极合理，一方面看出“诗文异辞”的关系，一方面也看出有些民歌所以不入乐的原因。但用来讲孔子所删之《诗经》，则六义之说不得不分别体用耳。